



# 豫南鄂北完成大殲滅戰

自五月一日起豫南鄂北敵軍分五路西犯，

一路由河南確山犯唐河，一路由信陽犯桐柏西之西興集，一路由湖北隨縣犯襄陽，一路由隨縣犯吳家店，一路由鍾祥犯雙溝。合計倭官兵

約十五萬人，飛機二百架，戰車四百輛。倭僑滿以為可以長驅直入，一洗去年鄂北慘敗之恥。却不料中我誘敵深入而反包圍之計。敵軍

後方聯絡線自確山至南陽之路，信陽至南陽之路及花園（在平漢路線上）至襄陽之路被我軍節節切斷。敵後方陣地如隨縣東之馬坪及平漢

線上之明港，長台關，柳林，武勝關等地又被我軍相繼克復。於是敵軍前後失去聯絡，左右

不能相顧，分翼狼奔豕突，到處遇到陷宰，被我各個殲滅。十六日我軍克復唐陽，十八日克復信陽。倭軍雖有少數隊竄於唐陽附近，猶如

釜底游魂，眼看就滅漸滅。軍委會發言人談：

豫南鄂北大殲滅戰……全戰場共斃敵達六萬員名，奪獲及擊斃敵軍馬三千餘匹，奪獲

及擊毀敵戰車三百二十餘輛，汽車二千餘輛。並獲其他武器彈藥無數，實為抗戰以來最偉

大光榮之戰績。」

我們知道這一大殲滅戰的完成，甚為艱難

。第一，敵軍有去年慘敗之經驗，經營審劃一年之久，五路出兵，南北呼應，其計謀甚為周到。第二，自確山至南陽、襄陽，鍾祥至隨縣

之大三角地帶，雖包括大洪，桐柏兩山，然敵我軍進出大半皆在平原。敵軍挾其飛機，戰車

，重砲與毒氣彈，其鋒不可當。形式上敵非不强，然而終被我軍殲滅了，這意什麼道理呢？

第×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對中央記者說：「用兵……只要看準機會，一本能獲大利。此次戰爭，我們放出愈多，勝利愈大。」又說

：「此次我軍勝利，完全為戰略之成功。我最高統帥部預示之方略，堪稱乾坤一擲之決手，足以震懾古今矣。」由李司令長官的話，我們知道這次勝利是戰略的成功。不過戰略的成功

何以屬於我而不屬於敵人呢，還得加以思考。

想透了便知道戰略的成功一定屬於我而不能屬於敵。這因為：第一，我們是全民族在抗戰，

而敵軍侵略是軍閥的主張。我國得運多助，敵軍失道寡助。第二，我國非求戰而是抗戰，人

人哀憤。而倭軍被迫作無目的的侵略，人人存厭戰反戰的心思。因此哀軍必勝。第三，我有

英明偉大的最高統帥，統一全國的兵力、財力、物力、與精神從事民族革命戰爭。這一次

戰爭是要從死裏求生的。而這次殲滅敵根據地最高統帥部之預示方略便是「乾坤一擲」。倭國

近二三年來因為軍閥權勢，不但沒有第一流政治家，也不能有第一流的軍事家，取以把雙足

陷在中國的泥潭裏。盲人瞎馬，還能有什麼打算？坂垣、西尾這一班瘋子雖有計謀，也是無謀之謀；根本上便沒有戰略，只有歸於失敗。

由此，我們對於豫南鄂北大殲滅戰之成功得到完全之理解，更堅固最後勝利的信心。讓我們放開喉嚨頌讚最高統帥，並且放

# 金華辦理計口授糧工作檢討與今後本省糧食管制

## 要點

黃紹斌

此次金華城區舉計口授糧，雖係創舉，然從工作上全部加以觀察，頗稱滿意，如準備工作之詳密週到，調查方面之迅速確實，以及授糧情況之進行順利，具見參加此次工作之同志均能勉力從事，本人深為欣慰。根據此次工作之經驗，吾人並可獲得下列各點之結論：

第一、工作人員之心理是否健全，與民眾瞭解程度是否深切，為一切政策成功之基礎。若干政策之推行，其不獲得成功者，主要原因係在工作人員對於政策本身未能瞭解，俯仰無從樹立，非惟執行時不能努力，日專政策之困難與失敗方面着想，甚有深望推行結果趨於失敗，藉以證明其推斷之正確者。失敗心理既隱藏於其前，則任何政策之不能成功，當可預料。此次金華城區舉計口授糧，吾人亦深懼有此項心理發現，故在事先，對於工作人員之心理建設，頗多指示；同時民眾對於政策之瞭解不深，亦易因疑懼而橫生阻礙，故於宣傳工作亦曾切囑工作人員特加注意。茲者計口授糧已告一段落，檢視此次所得效果，足證工作人員與民眾心理建設所關於政策之成功者至鉅，今後任何政策之推行，亦可於此得一明確之借鏡。

第二、事前之研究與準備，應為工作中之基礎工作。工作失敗之另一原因，為準備不周，與事前之未加深刻研究，以致臨時倉皇，敷衍了事，此項事例，實屬不勝枚舉。此次因事前之研究既頗精詳，準備計劃亦異常周詳，故工作均能順利進行。以後對於任何工作，必須於此多加注意。

第三、政策之推行，應著重於其根本，不應在枝節上多加顧慮。此次金華城區舉計口授糧以前，有若干人所顧慮者，多為枝節問題。吾人首先所應注意者，要以政策之應否實施為根本之前提，根本之前提既經確立，即有若干枝節上所生之困難，亦應在實施中求其解決，不能以此而影響整個政策之推行。此種舍本逐末之觀念，亦為吾國一般人之心理病態，必須予以革除，否則，任何應實施之政策，均將因之而中沮。

第四、凡含有流動性普遍性之工作，必須動員多數人員在最短期間迅速完成。在計口授糧之調查工作中，以人口及餘糧之流動性甚大，故非於最短期內迅速完成不可，否則，即難求其準確。此次動員三百餘人，於二小時半以內，即將人口、存糧調查工作同時完成，結果亦頗確切。於此，吾人並可認諸總動員之意義與其效力。

第五、城區實行計口授糧，為解決全縣糧食問題之主要工作。糧價之變遷，以城市為核心，城市一有波動，必致波及於全縣。如金華以前曾一度發生糧食恐慌，其原因在城區未能早為準備，存糧有限，而儲購者多，致供不應求，糧價日漲，鄉村大戶遂多觀望不前，以待善價，城區因之更形高漲，鄉村亦同時發生恐慌。若城區糧價平穩，不起鉅大波浪，全縣糧食亦不致有鉅大風波。此於金華城區舉計口授糧之前後情形中，可得明證者。以後各縣對於解決糧食問題，應認清此關鍵，則工作始有要領，收效自亦較易。其次，今後各縣對於糧食上重要設施應如左列：

一、計口授糧，各縣應立即準備實行。以上已曾提及解決全縣糧食問題，必先解決城區糧食問題，因此不論餘糧或缺糧縣份，對於城區計口授糧，應即時準備，開始實行。

二、實行糧食節約總動員。解決糧食問題，必須「釜底抽薪」，從消費上力事節減，若干縣份祇望省方多撥米糧接濟，不從本身消費節減上設法補救，非惟無補於事，且所望亦易於落空。退一步言，即便省方有多量米糧存儲，對於若干縣份可以儘量接濟，然不實行節約，糧食問題仍永無解決之期。並且所謂節約，在個人方面，不僅限於缺糧者，亦應及於有餘糧者。在縣的方面，不僅缺糧縣份需要節約，餘糧縣份亦應履行節約，

為根本解決本省糧食問題，必須實行糧食節約總動員。此次大綱辦法，省方不久即可公佈，在未公佈以前，各縣自可先期開始。

三、實行糧食生產救濟辦法。現在有許多問題，我常覺議論多而實行少，去年本省推行冬耕運動結果，對於糧食問題之解決，有不少幫助，所以實行為解決一切問題之最好方法。現冬耕期雖過，然推行冬耕運動之精神，應繼續發揮，如開闢荒地，增加生產面積，其不適宜播種水稻區域，儘量改植蕃薯一切耐旱作物，務使地無荒地，力無廢力，時無廢時，則各縣糧食生產量自可增加，在解決糧食問題上，實為治本之策。

總之，為求糧食問題之根本解決，必須以實行代替空言，從人助而進自自助。因此，主持是項工作人員，在心理上亦應有所糾正與改進。

第一、在目前行政工作上，是軍事第一，糧食第一。在過去以為糧食問題係屬於救濟或慈善性質之業務，臨時應付，即可告解決，要知在戰時糧食問題之能否解決，關係於治安之維繫與抗戰之支持者甚大，即就平時而論，計口授糧制度亦足以補助保甲制度之週濟，如戶口異動之控制，兵役之推行，均可由此樹立基礎，故此省方對於各縣糧食工作，定為中心工作，無論缺糧或餘糧縣份，均須加倍努力，毋稍貽誤。

第二、解決糧食問題係道德上之責任，亦屬政治上之責任。救災卹鄰為固有之美德，吾人必須保持之。在缺糧縣份，道德上所負之責任固少，而政治上責任所應負者甚大；餘糧縣份除道德上之責任外，亦應與缺糧縣份同樣負政治責任。換言之，責任問題係整個的，任何人均應負擔，缺糧縣份因糧食恐慌而發生不幸時，不但缺糧縣份本身應負有責任，即其他多糧縣份亦同樣負有責任，望各位能深體此意。

第三、自私心理必須革除。現在一般情形，仍不之自私心理之表現，如多糧縣份常嫌糧價過低，缺糧縣份對於所缺之糧食，亦多作誇大之估計，俱求其本身問題之解決，未能顧及整個之全省糧食問題，此不惟工作人員，一般民眾或更普遍。在短時期內，民眾心理之改革或不易收效，惟工作人員必須即時革除此項自私心理。

第四、不合科學之估計，實於事無補。各縣對於餘糧或缺糧之估計，俱未能做到準確程度。如以人口之多寡，而定糧食消費量，以田畝之多寡，而定糧食生產量。結果，餘糧者少，缺糧者多，非惟於事無補，且更增加問題之嚴重性。人口之多寡固為計算消費量標準之一，然存糧必須予以扣除；田畝之多寡，當亦為估計生產量之標準，然非惟於事無補，且更增加問題之嚴重性。人口之多寡固為計算消費量標準之一，然存糧必須予以扣除；田畝之多寡，當亦為估計生產量之標準，然非惟於事無補，且更增加問題之嚴重性。

第五、縣與縣間之封鎖，係以達到解決本省整個糧食問題之目的，依原省領計劃辦理。否則，易使問題愈趨複雜。此後，必須認清封鎖之真正目的，依原省領計劃辦理。否則，易使問題愈趨複雜。

第六、糾正依賴心理建立積極行動。檢視各縣處理糧食問題之情形，大都具有依賴心理。吾人對於外力援助之希望，固不能完全放棄；然除此以外，主要的在於本身之積極行動，如消費之節約，生產之增加，各縣均未切實實行，即運輸，糶袋，交通工具等，亦均推諉省方負責，此足以表示依賴心理過強，既未有積極行動，當然亦不能有良好的效果。所以希望以後必須糾正依賴心理，在自身行動上，有所表現。

第七、對於糧食消費之實與量之觀念，應整頓予以變更。過去對於糧食之估計，均以米為對象，在現在必須將可供食用之糧食，計算在內，若仍沿用過去之習慣，必以白米為唯一之食糧，非為抹殺現實，即係對於時代未有確切之認識。致於消費量，一般人仍以必須一斤二斤計算，此非為解決糧食問題，實係窮人鬧關，吾人須知不論糧食之實與量。不若仍以平時眼光加以估計，此亦深望各位必須深切注意者。

最後，糧食多餘之縣份，若省方指定採購之米糧已過過多，必須勉力從事，以期達到標準，如除指定以外，尚有餘力，亦應儘量採購，供給省方。如此，最低限度可以達到省方要求，進一步，可使缺糧縣份得更多之接濟。我認為辦理糧食工作，奉行法令尚嫌不夠，必須來一個工作競賽。缺糧縣份對於所缺數額，亦應有正確之估計，不能加成計算，多中取少，必須是最低限度要求；否則必致大家俱無辦法，問題當然更趨嚴重。

在上面，我已提出現在行政工作中，是軍事第一，糧食第一；不過，在我所得之報告中，有若干縣份糧食工作已有很好的成績；但是尚有若干縣份，對於工作中心仍未瞭解。經過此次指示以後，必須加緊努力，世上任何事業均在人為，不能因環境惡劣或工作上稍有困難，即認為無可挽救。糧食政策本含有強制性，必須規定強制執行之決心，認真努力。



是建設工作了。正好這時候中央縣各級組織綱要公佈了，於是我們就根據這個綱要對戰區縣政機構再作了一次改革。二十九年一月頒佈的縣政府組織規程不但充實了戰區縣政機構，增加了戰區縣政府經費，并且要不同前方與後方，戰區與非戰區，同時實行縣組織綱要。

從這個綱要改變縣政府的組織看來，便可知道做一件事不能全靠理想，因為理想與事實的表現往往不如此簡單。假定在二十六年冬天就把前方縣政府組織和後方一樣建立起來，充實起來，不是到今天便早有很大成績可表現了麼？但是我們亦不必懊喪，只要我們能在試驗中求改良，實踐中求進步，這些改弦易轡的損失是不難補償的。現在戰區各縣的組織已經擴大，經費已經提高，前方後方完全一樣，今後就得靠大家努力！

### (二) 地方自治問題

抗戰以後爲了動員民衆，地方自治的要求比從前更迫切得多，但是這事似乎又發生了一個矛盾的問題，那就是：在戰區中處理行政需要迅速、有力、上下一貫、才能與敵備相競爭；如果本實行地方自治，權力分散，成了一個支離破碎的局面，又如何推動工作？關於這個問題我們只要在縣各級組織綱要中便可覓得解決，因爲牠不僅是平時縣政工作的方案，亦是戰時縣政工作的方案；不僅是可行於後方各縣的法制，亦是可行於前方各縣的法制。牠的根本原則，一方面是強化從縣到保甲的行政力量，確立一個從上到下的制度；一方面是扶植下層機構使工作逐漸進步而確立一種固久長的基础。所以行政組織的加強與地方自治的發展不但不相矛盾，且是相輔而成的。我們從綱要條文就可知道行政系統是上下一貫，各種地方事業，民意機關如：生產，合作，教育，衛生，警衛，以及以上各種事業是從下而上的。以行政力量的提高來完成地方自治，而以由下而上的事業發展來建立由上而下的組織系統。

以行政力量推動地方事業，發展地方事業，而完成自治；這點非常重要。過去往往以爲擬了計劃開過會就算推行地方自治，而自治的真正基礎如學校，農業，水利，交通，反一無所有。所以要達到地方自治並不是縣長改爲民選，就算完成；亦不是縣參議會成立，就算完成；必須人民真能享受各種地方事業的權益，日能督促和管理；如道路，水利，興修的設備，合作的組織等等。但這些都是要靠行政的力量才能辦到。譬如合作社原來是人民自己辦理的事，但政府要設管理處，要派指導員。這是由上而下的行政力量用來扶植由下而上的合作事業，等到各個合作社健全了，便可不再需要管理。合作如此，其

他的事亦莫不如此。

這樣縣各級組織綱要已爲我們解答了第一個重大問題——地方行政與地方自治的問題，亦間接地替我們解答了平時與戰時的行政問題，後方與戰區的縣政問題。抗戰與建國應同時並進，所以在戰區各縣應加強行政，亦應發展自治。

地方自治既然不論前方，後方，都得推行；但是這裏又發生了一個問題：推行自治是否得採用保甲制度呢？這個問題的發生是由於不解解自治與保甲的關係，過去許多人都以爲自治與保甲是矛盾的東西，前者是人民的，後者是政府的，其實這是根本錯誤的。關於這個問題我過去已在不少地方論列過，今天只想說個大概。自治是一種原則，保甲是一種制度，這二者是互爲利用的。保甲沒有自治，做一個僅有血肉而沒有精神的行屍；自治而沒有保甲就像一個僅有精神而沒有血肉的幽靈。許多人認爲過去沒有鄉鎮保甲的劃分而實行地方自治的兩部基本書籍——建國大綱和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也不會說起保甲，所謂保甲只是劃區的制度。殊不知這是一種誤解，須知自治是一種原則，推行這原則則必得有個編制，這個編制即是保甲。正同軍隊，警察，國民兵團，以及各種訓練班，名目雖異却都有一種編制；不論是黨，連，排，班，或大隊，中隊，區隊，分隊名稱雖不同而道理却是一個。保甲的編制是我們推行數千年而最有效的，所以我們今天仍可繼續採用，不必另抄外國的方法。保甲在經濟上求自給，治安上求自衛，深合抗戰的需要。在戰區實行保甲不但可防止奸宄，又可便利征兵，只有這種有組織的力量才能抵抗敵人，打擊敵人。二十六年冬東戰場軍事撤退後頓時引起政治社會的秩序的總崩潰，就是鄉鎮保甲不健全的緣故，現在各方面都已澄清了保甲的價值，只有能自衛，才說得自治；只有有組織的自由，才配稱真正的自由。縣各級組織綱要亦納自治於保甲之中，明白地規定這是永久的地方制度，不是劃區時的權宜辦法。所以今後戰區各縣工作必須以健全鄉鎮保甲，確立自衛基礎爲中心工作。

### (三) 經費與人事問題

經費與人事是地方行政的根本問題，而戰區中這尤成了大問題。一方面戰事發生事務加多，平時更需錢，需人；一方面戰事影響家破，人亡，戰事更需錢，需人。有人以爲戰時應該節約些，所以一切都要緊縮。其實這是指個人生活上的享受，不是國家的費用。國家發生了戰事費用自必增加，猶如個人遇到了婚喪大事就要多用錢。所以除非不打仗，要打仗就得不惜工本，才可爭得勝利，不然偷工減料就靠不住。但

這錢又向那裏去找呢？當然要靠人民窄縮個人的衣食來貢獻給國家。但亦有人以為國難當頭人民已很窮困，不應再加重他們負擔，其實這是一面之辭，須知，國家既發生戰事，戰事又怎能持久呢？國難又怎能渡過呢？至於行政上的經費我們當然亦希望盡量節省，但亦得省之得當，不然反會因節省而增加支出的。例如造房子，造時偷工減料，結果戰後幾次風雨就要修理，修理次數一多，反超過原來費用。現在本省戰區各縣有許多財政也有了辦法，亦有許多仍很困難，這一方面固然是技術的問題，但一方面也是政治的問題。過去政府對金錢浪費太多，對公款侵蝕太多，以致失去了人民的信仰，增加了地方籌款的困難，亦未始不是重要的原因。所以今後我們對於金錢應有合理的支配，每用一個錢，就要有慎重的考慮，使其不致浪費，對公款要有穩妥的保管，每動一筆公款，就得公開，使人民不致懷疑。這樣建立起政府的信用，籌款便不致做過去的困難了。

說到人事目前似乎有二個問題，一是戰區人才缺乏如何補充？一是各部門的工作人員如何使他能調而不厭，以增進工作效率？

戰區縣政事務繁多，所以特別感到人手不夠，較之後方各縣需求才尤亟，但這種問題還得由我們自己去設法解決。就目前的環境說，還至少可有三個方法：第一、是破除門戶之見派別之分公開甄拔。過去人做官往往想權黨為私，所以儘量任用私人，所謂「不啻賢不賢，只問親不親」。因此甄拔人才的範圍就非常狹小，人才就更困難了。現在我們若公家俸事是一種服務，如此則人才甄拔的範圍既大，而有才幹的人亦可有個為公家服務的機會。第二、現在行政機關是一種普及人民服務的機關，所以其用人是在辦事，不在做官，因此只要有一技之長的人都可設法用其所長，只要肯研究有進步的人都可設法聽其學習；這樣一來人才自然不致不夠了。第三、是注意新幹部的培養和訓練。過去三十年來的學校教育造成了許多不會做事的書獃子，如果這種繼續下去，三十年後恐更不堪設想，所以現在的訓練就是補救從前的不足。但這裏又發生了一個問題，許多人都視青年入參加工作為外行而瞧不起，其實無論什麼都應有補充，不問他年輕年長，只問他對工作有無興趣和修養夠不夠。訓練班決不是沒有意義的，但因需要迫切感覺不夠，所以我們更應從工作中去訓練，鄉鎮保甲長，村長，區長，都應該是訓練者，均應該切實負起訓練的責任，如屬餘糧，全省有五十多萬甲場等於有五十多萬訓練班。所以凡作長官的都應如古人所說「作之君作之師」，以身作則領

導全體。

人才已有了，便應互相合作，不應再讓他人互相磨擦致減少力量。過去我們常常聽到人事的問題，其調整的方法真以人地不宜，工作不宜為藉口一調了之，其實這不是根本辦法。一個人在甲地不能與人家相處，到了乙地亦未必即能相處，所以問題還在自身。現在我提供幾個原則給大家參考：

(1) 與其責人，不如責己。人事問題的發生往往為於一件很小的事結果鬧得面紅耳赤，計個你死我活；但如果當時能退一步反躬自問，究竟誰對誰錯？錯在那裏？值得不值得？就會雲消霧散了，所以古人說「克己復禮」，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只要避免惹起爭端，採用公開裁判那就不會和人家發生磨擦了。

(2) 只怕自己站不住，不怕人家有批評。俗語說「箭字大不入」，我們只要自己不做虧心事，站得穩，儘管人家批評，搗亂，漫罵，毫無關係，終有一天會水落石出的。人人這樣，便可省去許多人事上無謂糾紛。

(3) 自己肯努力不怕沒進步。一個人只要自己肯埋頭苦幹，有一愚公移山」了海和尙鑿鑿道」的精神，不管人家的譏笑和謔言，總有成功的一天。明朝武訓討飯辦教育終於成功即是個好例子。至今人家只知乞丐武訓而不知當時「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的皇帝是誰？這就是因為一個有不朽的事業留下来，使你永遠紀念他，崇拜他，所以真正的名譽和地位全憑個人的努力所創造，多一分努力即多一分收穫，假使個個人都這樣，社會上就沒有人事問題了。

(4) 以競爭代替鬭爭，競爭是用正當的手段改善自己，努力爭勝，這是一切進步的來源，是我們應普遍採取的，至於由嫉妒而出發的惡意破壞人家，則是鬭爭，這就成了磨擦的淵藪，為我們所愛竭力避免。同事之中尤不可令此風生長。現在一切都在擴展，我們必須吸收新幹部加緊訓練，如兄如弟，互相切磋琢磨，在工作上促其進步，大家能這樣就可減少許多人事上的磨擦。

戰區各縣，敵我相持，血肉的教訓就在眼前，而過去仍多人事問題，實在十分不應該。此後地方人士對於行政人員不可前恭後倨，始則歡迎，繼則為難。行政人員對地方人士更須開誠布公，以誠懇坦白為立身行事待人接物的基本。果說大家能過去用於人事問題的精神力量，都集中到抗敵禦侮上面，則不特戰區行政將有長足的進展，即收復失地，必為期不遠，希望大家多多檢討，特別注意。

# 物價與後方經濟

陳岱孫

從中日戰事一開始一直到現在，關心於抗戰前途者，對於國內經濟支持力的強弱，無時不表示擔心。誠以現代戰爭不只是兩國軍力的比較，而是兩國整個國力的比較。在兩國整個國力比較的時候，經濟力是軍力的基礎。歷史上不少的事例可以證明這個看法。戰事已快三年了，我們不但在軍力上逐漸取得一個主動的地位，不斷的予侵略者以重大的打擊，我們的經濟也能支持如許之久。這是一般人在戰事方面開始所不敢希望的。向前看，中日戰事還要一個長期方有希望結束，至少，必須歐戰先行告終，方有一個有利於我們的轉機。軍事上，我們相信沒有問題，於其支持這軍力的經濟力，便是主要的樞紐。

一年來，後方主要經濟的變動，就是物價的增漲。固然，物價之漲不是最近一年的事，然而漲得引人注意——漲得驟而烈——確是這一年來的特象。漲的因當然是參雜的，然無論如何，漲的結果是造成一個恐慌的心理，而搖動一般人對於經濟支持力的信念。經濟力有兩方面的分析：一是與前方有直接關係的物資給養，一是後方一般人民的生活。有關於前方這方面的分析，本文不擬詳論。我們這就後方生活一方面加以探討。

有一點我們得先弄清楚，經濟力不是錢，是物質（是已經生產的物產，與能繼續生產的資本與工力）。如果一般人民的生活都放在戰時的標準上，我們後方經濟力應該絕對不發生問題。固然，我們失去若干富足的區域，然而我們後方的物資只有比抗戰初期為豐富，絕不比一年前為遜色。若是在過去三年內，後方的物資足以敷用，則繼此以後，絕對的數量也不應發生問題。無論那一個時代，戰時人民的生活程度一定要降低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象。因為公家需要的增加，人民的享用必須削減，這一點，我們相信後方一般人民都誠心樂意的接受。我們一般人民習於儉樸，戰時的生活標準只要有糧食粗衣便足維持。在食一方面，前年和去年，後方各省農作物無不豐收，今年亦復如是。以絕對數量論，

足食一點，絕無問題。其他生活用品的供給，不如食之樂觀，例如衣，原料與生產都較有問題。然而主要的用品，我們非絕無基礎，如果政府在此類物品生產方面特別注意，另一方面，人民以極節省的法，來享用這些物品，則此類物品，雖寬餘未必，却足用可期。我們說，把一般人民的生活放在戰時的標準上，戰時的標準便足食足衣之餘，其他的享用不應甚差。

物質絕對的數量既然不應有問題，則問題為相對的，為物質的支配。物質變動的影響，就是在這個關節上發生。物質支配的問題有二：（一）政府與人民間的支配，（二）人民間的支配。政府與人民間的支配，就是在還有限的物質中，政府徵調者若干，留為人民享用者若干。政府徵調者多，則人民所能享用者少；政府徵調者少，則人民享用者多。在平時，這個關係已然如此。在戰時，問題的性質沒有變動，而重要性大為增加，因為在戰時，政府的徵調當然較平時為多，於是人民生活程度便受了影響。政府徵調的多寡，初不必一定影響及於物價，然物價確可因徵調方法之不同而生影響。在過去歷史經驗中，戰時政府徵調多，物價總是漲。這個偶合，只可說是過去戰時政府都不能完全利用不引起物價變動的徵調方法，而必須一部分利用會引起物價變動的徵調方法。（我們並不以為歷史上戰時物價之變動，都是由徵調方法的差異，我們更不否認今日我們後方物價的增漲，有各種不同的理由，其實我們相信，我們今日後方物價的增漲，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於投機，囤積，恐慌心理等等理由，與政府的徵調無關。我們不過要說明，在理論上，即使這些理由都不存在，物價的變動可以由徵調方法差異上而產生。）

政府徵調的方法有三種：（一）稅，（二）公債，（三）通貨的發行。這三種方法，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結果：第一種結果，是直接將人民原有的購買力移轉於政府；總購買力沒有增加，而人民所能支配者減少。物價並不提高，而人民因購買力減少，購買量及享用亦減少。

第二種結果是間接的，以政府新創造的購買力，添加於原有購買力中，以沖淡原有購買力的力量。於是在表面上，人民手中購買力的數量並不減少，而其所能換取的物質實是減少。這個沖淡原有購買力的作用，就從物價增強中見之。稅的結果是屬於第一種；通貨發行的結果是屬於第二種；債的結果則可屬於第一種，也可屬於第二種。如果債是由人民以過去的儲蓄，或現在消費所節省者承購，則為購買力的移轉，而產生第一種的結果，如果債不由人民承購，而由銀行承購，且銀行得以債券為放款之準備資金，則可造成新購買力，而產生第二種的結果。這兩種結果，雖然都是減少人民物質的享用以供給政府，而物價所受的影響顯有不同。歷史上交戰國之內物價，總是增強者，不過證明沒有一個戰時的政府，不得用一切能發利用的徵調方法，作增加國庫收入的工具，雖然，偏重的程度可以不一樣。我們當然不是例外。這是戰時物價趨勢一個原因的簡析。

就這初步分析來說，雖然不同的徵調方法，可以決定物價之受影響與否，而其結果——減少人民的享用以供給政府——則一。於是政府與人民間戰時物質分配的問題，便是如何可以維持一適當的均衡，一方面政府能儘量取得戰時物質的供給，另一方面，在戰爭的時期，講政府支出的節約有近於迂，尤其我們現在的使命，不但是抗戰，並且是要同時建國。不過我們不能否認政府的支出，除與抗戰直接關係者外，總有個先後的區別。尤其在我們建設計劃中將來種種的支出，更不見得沒有緩急之分。建國原不專以有利抗戰為目的，而至少初步的建設是以有利抗戰為急為先，更絕不能直接的或間接的有害於抗戰。於是政府種種建設的計劃，便不能不量財力；財力不是錢而是物質，是在作此支出時，政府所要增加的新徵調（不論徵調方法之為何）。戰爭的時候當然以勝利為第一，鑄錢計較的預算當然不適用，而現代戰爭的費用，當然是龐大得可驚。這種戰時措施，本身雖不應有疑問，而很容易造成一個與軍事無直接關係一切支出的放任心理。於是一談建設，或其他政務上的新設施，便可不論先後緩急，以極力擴充事業為務，而每項新事業的費用，可動輒千萬，甚高。這種心理，在我們現在抗戰過程中，倘沒有顯著，

然而大有加厲的危險。如果這種心理與辦法不加以裁節，則政府的徵調必須增加，政府徵調既多，則直接徵取人民購買力的方法將愈見困難，於是物價有繼續增強的可能。政府與人民間的物質分配，若因此而失其適當的均衡，則後方的經濟便要發生危機。

講到人民間的物質分配，物價變動的影響就大了。上面已經說過，在戰時，人民應該減少享用，以供給政府，是天經地義。如果戰時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普遍的，一律的減低，則徵調雖重，人民不怨。如果物價的變動，不擾亂戰時人民間物質分配的情形，則徵調方法之如何——不論是稅，是債，是通貨的發行——初無二致的結果（雖然我們並不忽視物價高漲所造成恐慌心理的反響）。然而物價的增強，確能使人民間的物質分配發生脫節情況。物價增強後，一部人民的物質享用減少，有一部人民的物質享用不但沒有減少，並且有時而增加。簡括的說，薪工階級，儲蓄者，債權者，及一切固定收入階級，都是吃虧者，因為他們的儲蓄，收入都是以固定的錢計算，而現在他們錢的數量儘管一樣，而物價貴了，同樣數量的錢所代表的物質少了。另一方面，各項企業者，物品的囤積者，債動者，及大多數非固定收入階級，都是佔便宜者，因為不是他們的收入隨着物價而增加，就是他們担负的實質，因幣價落而輕減。這還是人民間物質分配，因物價增強而脫節的最低情況。在這上面，如果再加上投機營業，外匯操縱，食糧壟斷等等不正當發國難財的行為，這個脫節的情況更為嚴重。於是一部人民掙扎於生活壓迫之下，而另一部人民顯露過肥過其發戶的侈裕生活，脫節的結果，不但影響及於一般人民的精神，並且有害於前段所論的政府與人民的支配。以物質總量言，也許政府的徵調，有侵及人民維持生活所必需的物質，而人民間支配失調，可使得一部人民的生活發生問題。物價愈漲，漲得愈快，脫節愈大，問題也愈嚴重。於是政府與人民間的支配也發生問題。而後方經濟的力量便要削弱了。

以上都是在理論上推論物價增強可能的危機。為防患未然計，我們不能不即時加以應付。當然，照上面的請析，物價增強所引起人民間物質分配的失調是較為嚴重的問題，政府的對策當然要針對着這一點。在這一方面的政府可以採取的辦法甚多，例如戰時利得稅徵收，投機營

# 中國智識份子應該轉向

「中國文化底特色或長處，就在能發揮人類之理性。理性之發揮，為的要解決人對於人的問題。……而所以解決人對人的問題，不由向外用力的途徑，而祇是反求諸己，盡其在我，亦即成了一種自反的精神，或曰向裏用力的人生。」

「科學文化的根本精神，在向外用力，兩眼向外看，此其所遇為物的物質，為空間，為理智分析區劃所最恰便適用之地，故歐洲大才英偉之倫，心思聰明，向外用力，就產生了物質科學與科學方法，中國理性文化的根本精神，在向裏用力，在兩眼回來看自己，此其所遇為動的生命，為時間，為理智分析區劃所最不便適用之地，故中國天才英偉之倫，心思聰明，反用諸其身，自成就他的一套特殊之化，而無從產生物質科學，和純乎理智的科學方法。」——梁漱溟

就智識份子本位立論，中國之積弱，實在是幾千年來中國智識份子將聰明睿智偏用了和浪費了的結果。

試回顧一下：自古以來，我們的「讀書人」。竭盡其力在研究的是什麼？彼此在探討的問題，多以什麼為對象？影響着我們底生活的，又是怎樣一宗文化思潮？中國向來的所謂「儒者」，不是講來講去都講的對人問題，而對人問題的解決，又不是向來執着於「向內用力」。「反求諸己」，即講究「發揮人類之理性」的一面嗎？「勤於作人，淡於逐物」，中國人以為清高，殊不知人類之生存，除了人與人類之間的日常對待關係而外，還有更基本的人與自然之間的「物質代謝」過程。專於人事，忽於物理，

業的禁止，奸商壟斷的懲罰，交通事業的改進，糧食及其他生活必需品支配的統制等等。這些辦法確然可以大大減少民間物質支配脫節的程度。然而，有一部分的問題是物價增漲之內在的質性，為政府對策所不能調整。例如上述的儲蓄者，及一切債權者（如銀行存款，公社會債券所有者等等）因物價增漲而受之損失，與一切債務者，因物價增漲所得之利益，俱為政府調整民間支配脫節各項辦法力量所不及。所以政府的對策無論如何詳密，只能局部的調整民間支配的脫節，而不能全部的與以調平。如果物價還是繼續增漲，一部人民還是吃虧，另一部人民還是佔便宜。我們不是說政府各種對策是無效，相反的，我們絕對主張政府應該利用各種對策以削減民間支配不調的現象。不過我們以為一切對策都不能解決全部的問題。所以問題的樞紐還是我們能否使物價不漲。

如果我們果能使物價不漲，則上述的問題可無特解決而自然解決。然而根據歷史上的經驗，我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只能希望物價的增漲不要急驟。有一部分物價是由於私人的操縱。這一個因素政府可以用嚴厲辦法來剷除。上面所述政府為調整民間支配脫節的若干對策，一方面是針對一般人民物質享用支配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阻止物價無理由抬高的辦法。此外心理的影響也是一個主要因素。心理的不安只能以相反心理的造成為對待的辦法。如果物價的變動是和緩的，人民對於幣值的信念可以逐漸恢復，心理的不安也不至產生一個恐慌的影響。於是我們又回到上述政府與民間物質支配一個問題上。政府對於私人行為之足引起物價增漲既然應該加以裁抑，政府本身的行為，如果與物價變動也可發生影響，當然也應該加以注意。假使徵調方法不允許我們有時輕騎重的選擇權，則政府民間物質支配的權衡，便是政府所應注意的焦點。從今起政府各部份設施，尤其各項新興事業的創辦必須權衡緩急；與軍事有關者，與人民迫切生活有關之生產事業，當然要舉重若輕。一切事業的舉行仍須顧到經濟節約的原則。國庫的支出不能大量的增加，徵調的方法也可以易於調劑，物價的漲勢自然可以大殺。總而言之，我們物質的絕對數量不成問題。在漲勢的兩方面，我們能努力做去，物質相對的分配也應不生問題。具體調整的方案當然有待於細密的研討，而原則似乎不能不看得清楚。（自大公報轉載）

則人生物質條件進展的契機，為之斷喪，流弊所及，世道人情，反而淹沒。這學先生固久矣夫感嘆「人心不古」了，却沒有想到罪過就在這裏。無數中國智識份子底智力沒有用得當，如數都在「最不便適用之地」浪費完了。於是，上焉者，祇做了行已無愧於國家民族却鈔實益的「君子」，下焉者，則盜名欺世，亦復自欺。「向內用力」的修身之道，雖底肉眼都不能見證；言行乖離，可以有遁辭。但人的感性畢竟是銳銳的，所以「假道學」這名詞，便作為一潔白的「污點」，永遠發在中國讀書人底鼻尖上！

中國的智識份子，講了幾世的做人道理，鮮有功於世道人心。是事證昭然的。翻開歷史，國家總是那麼亂嘈嘈；看看周圍，人情總是那麼醜薄。原來：（一）做人的道理，主要的祇在切實如是做；固不是千言萬語，却勞唇舌可以湊功。「子曰：子欲無言」，孔子恐怕是真有所覺悟，而不禁如此感慨的吧。而後之學者胡塗，不從簡易處去實踐，却把心思，能力，時間耗盡於多餘的言辭，其實，孔孟而後，講道學者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說不出更多的什麼道理來，多少可以用之於致書強國的實質精神，都是如此白耗了。（二）「向內用力」以求對人問題的解決，在原則上，方針沒有錯，然而對人問題的解決必須有其基礎，即對物問題的解決，缺乏了一定的物質條件，對人問題的徹底解決，便不可能。直矣、富之、富矣、致之。當孔子適衛，冉有從，在彼此的問對感習中，可知孔子底原意：禮教的施行，必也亦有其先決條件。而一般的中國人一直將基礎問題忽視了，所以講精神，講得一天星斗，經不得事實一碰，便暴露出自身底脆弱。「程子曰：今人不肯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肯讀」。並不是不肯讀，你看幾千年來，多少有心人珍視經書，註釋經書，廣播經書，又多少人在讀着經書？而竟一行也不進人心裏去，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還是此等人者，多半是由於做人的法則實際上是受現實社會諸條件的約束，而自古迄今的人又還未嘗有那麼的大力把握那麼的理性，能到達擺脫世利自全其仁的地步。而今之世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去大同之域到底太遠，中國雖有著地人物博的先天優裕條件，作了扶育歷史上的理性文化之搖籃，而人為經營的物質，歷來缺

乏基礎，後世學者不察，不知道同時在賴以生發此種理性文化的苗圃上注意加肥的工作，（即物理的地球社會之更富強），眼睛祇放在先賢精神遺產之浮面，因循逐末，所以幾千年理性文化，不但國家，連文化本身，亦祇有愈講而愈弱，愈究而愈窮。

在本質上，理性文化原是一種比較高級的文化，寧可把它視為一種祇適應於大同世界的文化。當大家的生活大致可以過去，多化一點時間來講發揮性理，考究待人的道理，使人與人彼此相處得更合理些，這原是應該的。在中國的閉關自守時代，在中國先天的優越物質條件還可以供養大眾，在生活上不發生根本的困難與衝突的時代，這種文化是能够存在，而且能够被大家接受的。如果我們不能與亂展這種文化並行發展着物質生產，而時代往前走，使供養我們的物資與我們的生活脫節，失去平衡，社會趨於分裂的時候，這種文化就祇能作為特殊存在，為生活優勢的特殊人們所利用。我常常想，偏向精神的中國故有文化——即理性文化，實在是一種特殊階級的文化，說得明白些，它是治人底文化。他們不愁三餐，在生活基本條件上無所用心，自然容易把怎樣引我們底生活向上的物理的那一面忽視了。（實際上，怎樣引我們底生活上，不單單是理性上的道理可以為力的）。而意謂天下大事就祇有一個人事。所以一天到晚，研究那一套居處，執事，與人的道理，其實祇哲底原意，這些祇是「為己」，覺得個人應如此，立志如此做，便如此做，模稜得便。到了後來，學究却當它是一種特殊的經營之術，完全「為己」，或以此招搖過市，或以此叩門投刺！：：：所以愈弄愈旁，實則去聖經實傳之旨，何止雲泥之別！中國久遠以來，便祇祇微地造出了這樣一批先生們：他們可以書寫騰騰地終日跟你道理說談，「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固然不用說了，就是轉背他怎樣做人，亦不堪問。但無論怎麼說，我們底特殊文化，還是被一批不慈口腹的特殊人們所標榜，所嗜好，所利用。因為它到底是唯一可被利用的符號名利的手段，因為它到底是唯一可被利用以使大家自力維持社會秩序的特殊方法，當它還可

立己人達己達人的「聖學」，與夫以後實際上已經是「聖學」之變質，而為智識份子所固執的那一套虛玄文化，所以能够在過去中國社會上存在。(一)我重複說一遍，最早是因為中國地大，物博的先天地質環境所孕育。(以農立國的人為環境亦盡了催生作用，且不談)。(二)我重複說一遍，是因為有一個長期間我們的自然物質條件還可以將就生活，作為基礎的那東西還沒有決定作用地失其維繫之力。(三)我重複說一遍，是因為從古以來的中國，却在閉關自守的狀態中，決定其社會底「上層構造」者祇是它自國內底社會諸條件。雖然中國在歷史上幾次會亡於異族，但他們持以亡中國者是單單的武力，一般的說，他們的文明都不及當時的中國，所以他們祇能一時在政治上給以擾亂，而無能在文化上給以決定作用。(四)那就應該說：「聖學」之變質。實際上溯洄於中國歷史上者，多半已經是這種變質的東西。

「講」理性之學，實在是廢事的事情，「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孔子有胆量說這話，除了具備有「樂貧」的內底修養而外，在當時，孔子一定還先行見有可以「樂貧」的外底條件在。倘使貧的程度至於威脅生存，——連活也活不下去，叫他怎麼「樂」法？孔子說翻開頁：「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而同也畢竟食尚有一簞，飲尚有一瓢，居尚有陋巷。否則那祇有硬挺，倘樂道而真有如此其人，要勉強也許可能的吧？但中國講理學的入却又反對這個，感有勉強，說「這便不是了」。這樣，不是縱有「樂貧」的宏願，也祇好「麗志以歿」嗎？(伯夷叔齊在此地不能作為反證，他們餓死首陽山，不是樂貧與否的問題，不是我們日常的生活態度，那是非常的臨大節而不苟。)至於「富而好禮」，除了為富不仁者，這似乎復便當的，但我看亦決不簡單，如果所與的社會上，你富有，而有的貧困，未能「樂貧」，或者有的赤貧，無法「樂貧」，(這決不是你底主觀可以勉強的，)這時候你怎麼辦？能發揮理性之極端，「願釋物我，通乎宇宙萬物為一體」，不用說你就得視人如己，盡分你底富與貧者；如能「好禮」至於此，當然省事多了，可惜事實上，自古迄今，(姑不論將來)，還是個未能承接的理想。「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而今之人世間，要我一「無終日之間違仁，造次

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的真正的仁人君子，又何其難呢？這無非說明：人類社會的關係究竟複雜，在我們的社會制度還沒有到達為我們打下一個容許我們每個人都自然地由衷地講求道德修養的堅強基礎那境地以前，專門將目光與功夫放在個人道德上，其用心可謂「良苦」，而結果却總是空的。原來，如不問實效，就對己而言，行道固然比較朴略，但一舉及人事，問題便不同，孟子說「一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如果天下只有一個魯魯遜遜，衣食無愁，問題不待說很簡單，待世間有了兩個八以上，情形就不止一萬倍地複雜起來。這時候，不僅是「你應該怎樣待他」，「你能够怎樣待他」，「你究竟怎樣待他」之類的自你的問題，還有「他應該怎樣待你」，「他能够怎樣待你」，「他究竟怎樣待你」之類的自他的問題，而今之情形，夫妻相處，猶未能盡善，遑論其他！日常所見，無關大體時，彼此儘可以「彬彬有禮」，遇到利害關頭，就顯得個個促失能。此際，如果還有所謂「道德」——那祇是「權術」。甚而祇是注精衛底「無恥」。「天下之無道也久矣」

當衆人以「道德」之美名遮掩「權術」使用的今日，如果我們專心誠意惟精神修養之是求，則忠厚將不免成為迂腐，而在歷史上最先佔有人類開明的理性，曾幾千年大言禮教，把一雙眼睛反看着自己內心，看得近視了，意謂凡事祇要「反求諸己」全可以解決，結果，幾千年來忽於物理，不知道宇宙之大，人為着提高生活另應該研究與創造的事物，多得很多；不知道宇宙之大，除了一個中國，人與人的關係及於更遠大的廣袤，一旦列強侵入，便證明自己營養不足，積疾已深，竟至於無能抗拒外力，角關於生存競爭之沙場。在如此中國，如果還有強強弱弱愛個人「誠意正心」即足以挽救今日之國運於危亡，則其存心忠厚不僅流於迂腐而已，惟恐心未正得，而賴以生賴以存的國家民族却先被異族毀滅了。

其實，這破綻不遲待今日早已暴露於中國歷史上，最顯著的如宋代，理學風氣，瀰漫一世，金人打了進來，所謂道學先生還是一天到晚背心背性，以為抱往精神便可以濟世似的，不從實際行動，去收復中原，結果他們底業績，到底有幾多裨益於國家呢？同時有陳同甫者，不勝感

憤，說：「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事實是如此。

總幸的是，過去侵入的多是北方游牧民族，武力以外，別無長物，本質上當時的漢族比他們強，所以結果，都被我們同化，我們也還是翻身了。所以我們的「儒士」，還是可以自成一家，「不關痛癢」下去；而理性文化，雖然越後越骨瘦嶙峋起來，但總還可以苟延殘喘。

不幸的是，現在情形完全不同，自己因向來疏忽物質科學，社會生活便一般的更形困難，影響所至，甚而「士風日偷」。更不用說以理性文化去期望於大眾。再則，列強視中國為理想殖民地，為商品傾銷場，爭而侵略，有其必然性；你向他請仁義道德，等於空口白道。「不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就是孔子也毫無辦法。而且他的文化，現在比你強，你更不必幻想以精神修養去感化與同化他們！

遺憾的是，站在現代中國人的立場來講，中國人在文化上講究理性，未免有早熟之感，本質上尚未成年，便先來談這個；大學教人正心誠意，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而我們將先決的一段丟掉了，偏偏又專門來談這後半截；結果使活到今天的整個中華民族，在發育上顯然帶着了幾乎難以補救的缺陷與廢疾。

無論如何，當面廣日本強盜的侵略炮火，以言挽救中國之急務，決不在於嗚呼專門請求怎樣去更加發揮開明的理性，開揚做人的道理。當面是緊要的，譬如：「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見發不為，無勇也」，「勇者不懼」，「人不可以不知恥，無恥之恥，是恥也」；所有這些，合而貫之，不外乎教我們做個堂堂正正的人，教我們「操善而固執之」！當我們的國家為正義而戰，需要我們的時候，我們便俱有「白刃可蹈也」的精神。但這些道理，中國的古哲先賢已經講得很多了，只要從其中擇要取得一二章，甚至一二句，理會得，實踐得，便已足夠。「做好人，要做就做；並不像學駕飛機，要化幾年

功夫，急急忙忙不能做到」。我們稱他為「青年老先生」的余蘊齋先生底閒談最有道理！世間最理性者，總是剛毅木訥，言恥弱之不達也那樣的精神底人。而巧於首飾者則多是空談家。況且向來以及「現在我們中國，不是精神不和人，乃是學問不和人，以致弄到這樣的田地：講政治，沒有政治家，講經濟，沒有經濟家，其他一切，亦都如此；祇看見人，看不見人才。甚至一點小農工業，也找不出幾個技術人才，老百姓生起病來，沒有人醫，豬瘋牛瘟，沒有人理，虫災水災，更沒有人管，祇祈求神拜佛，結果肚丁病多，影響抗戰，生產減少，影響財源」！（余蘊齋先生語）所以我大聲地說，建設新中國刻不容緩的事，畢竟要去研究我們所缺乏的所需要的東西，——即科學文化。我們智識份子底眼睛「向內」太久了，現在應該轉向外去！

人當「向外用力，兩眼向外看」作對於自然的觀察、分析、認識、創造的科學研究時，能夠同時「向內用力，兩眼向內看」不放鬆「修身養性」的道理，（但不是終日去講經，終日去讀經，這很少用處。）當然最好，實際要求也須要我們持這種態度，可是，兩者萬一不能兼得的時候，事實上沒有那樣的事）則我意謂：寧可把後者放開一邊！如其猶有人過分重視經書，則我意謂：不如完全拋棄它！早年吳稚暉老先生主張將經書拋到毛坑裏去，至少拋棄它三十年。現在我想亦不為無理！「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乎！」

譬如人病，到了元氣大衰的時候，猶諱言本身底殘缺，日日夜夜戀棧着向來自傲的「內心」，遂人便說：我底精神如何如何豐富，我要如何更發揚我底理性。甚或強調着說：我賴以生存者就是這種精神，就祇要它便可以恢復自己底健康。這實在是大可以不必的。尤其是當寇惡侵入，山河殘破的今日，莫說為國家民族着想，就是對自己講，莫說生為中國人，為中國着想，就是作為旁觀者看！這種觀念，亦未免使人感覺太殘忍！

如竟承舊以為是，這總違背了今日中國人做人的道德呢！

## 納粹底優勢空軍

張彥譯

上星期當皇家空軍軍飛波蘭作夜間偵察時

，航空部長伍德 (Sir Kinty Wood) 到院通過了一筆「空前的」航空部預算，並立即領到了一百鎊他所請求的保證金。英國航空部長在表面上是够熱心的，他嚴肅地公開申述了同盟國時飛機底製造量現在是較德國底夢大了；因為皇家空軍高速的第一線驅逐機——*Spitfire*、*The S. pitfire* 和 *Hawker, Hurricane*——在過去六個月中已經增大了一倍，重轟炸機底產量則增加了百分之五十。

這一樂觀論調是與這般令人喪氣的美國智者們所說的德國佔五五——四五優勢的論調不符的。它尤其跟來自對同盟國頗表友好的中立諸國的確切統計數字大相逕庭。這些（不意指出了美國不僅落在參戰各國之後，而且還得望塵莫及）指示了德國空軍配置底優勢似乎長成濟已幾個月了。

因為這些華盛頓方面認為可靠的數字指出了：德國對同盟國除了在空軍最主要的攻擊武器——轟炸機（參看圖表）上佔有絕對優勢以外，即地底製造率，也是為她們所不及的。而將來的情形則更壞；因為到九月裏，德機底製造就將突飛猛進了到這樣的程度：她將可能把

她目前的空軍每四個月增加一倍。

根據華盛頓方面的估計，德國現在一月可產飛機二千三百架——較英法底合計產量多百分之四三。在英國，雖然產量增加的傳說紛紜，雖然伍德先生底談話有聲有色，但其產率已由十二月份的二千二百架減至一月份的八百架，今就假定她現在已回復到一千二百架的產率。至於法國，就從來沒有能一月的最高額到達四百架的，她底產量早在一九三九年即月減四十架了，同盟國底最高限度的產量：每月是一千六百架。

若說要一拼一的對付德國空軍，那麼同盟國必須依靠她們自己底工廠。因為即使她們向美國長期定購飛機十萬萬元，她們要在一九四二年前完全交貨，是鮮有希望的。但德國由於產量底猛增，到九月間有月產六千架的可能。

從上星期「最權威的」數字上看來，很明顯地，航空上將艾林底空軍是以此為目標而建立的：強調以重轟炸機攻擊同盟國。而同盟國方面驅逐機底較高的百分比，也說明英法正在建立一防衛的空軍來擊潰德國底轟炸機，又基於武器底落後，同盟國必須採取猛烈的集中迎擊這一事實。

空軍法（在現代戰爭中還沒有被試驗過的）說：一個飛行員至多允許毀損三架飛機。但飛行員們也是鮮有把飛機毀損的。德國教練機底數目，證明一代驅逐機駕駛員艾林並沒有忘記這一課。德國底教練和設備較之同盟國要強百分之二五。這是一個毫無疑義的推測，說它底作用是在相對地減少當大規模空戰時着火和被擊的人員底殞命。

在驅逐機式底底高成就上，伍德先生能够，也曾經，作過這麼一個可辯的誇張——他上星期透露存多少帶野過火的預設裏的誇張：他相信一百架 *Spitfire* 或者 *Hurricane* 可能對抗數目遠甚的德機，意思是指 *Messerschmitt Me, 109* 或 *Heinkel, 112*。因為 *Hurricane* 和 *Spitfire* 在構造上已大大地改進了（主要的是美國式恆速的金屬推進器代替舊式的木製推進器）。他還說一向以追擊敏捷著稱的 *Spitfire*，其速度頂點已接近每小時四百哩，可以說是目前在歐洲最優良的單座驅逐機。

在戰略上是十足保衛性的短程的 *Hurricane* 和 *Spitfire*，都不能執行長程護送戰鬥機偵察或轟炸的任務；而英法現在也都沒有製造像美國新型的，雙座，高速，長程的 *Lockheed P-38* 護送戰鬥機的可能。德國則有配置大地的 *Me, 110* 式的雙座高速機，它底任

務將在防禦 Spitfire 和 Hurricane，以及法國底 Dornier 和美國底 Curtiss 攻擊從事轟炸中的德機底背部。上星期陶爾登氏 (Toulon) 在下防操出了英國還沒有 Me. 110 底對手的警告時，沒有人能反駁他。因之除非英國能製造這種戰機，否則必將這一工作交之於輕型的轟炸機身上，叫它們武裝起來去做它們從來沒有做過的任務。

在轟炸機方面，英國（也就是同盟國）最

出色的要算巨型而凶猛的 Vickers Wellington 它是一種強力而可靠的載重機，連率底頂點每小時為二六五哩。而輕量的 Bristol Beaufort (大小與 Lockheed 相仿)，每小時速率最高度則為二九五哩。但都需要戰機為之掩護，在這率上也是難與新型的德國 Junkers Ju. 200 相匹敵的，它底速率頂點每小時三三〇哩，可以任何的升起姿態直擊敵人。對於 St. 8K，以及速率較低的 Heinkel 和 Dornier，英

國已有了幾個回答：現在在製造中的，有輕型的 Bristol Beaufort——最高速度每小時三一〇哩左右。Handley Page Herford，以及其它許多類型的飛機。  
 魁隆中的法國，它底 /moo 370。它底 Beuch 131。它底 Horey-er-Ciller le C-45，在構造上都以新的設計改進了。只要時間，同盟國可能趕上德國，甚至超過她；假如貧困的納粹一旦將他們底銅鋸等原料積蓄經過告罄的話。(完)

(原文載四月廿七日 China Gazette)

### 交戰及非交戰各國空軍比較表

國別	重量及中量轟炸機	驅逐機	雙座戰鬥機	轟炸戰鬥機及輕轟炸機	偵察機	教練機	其他	總計
英	三, 二二五	二, 八〇〇	〇	四, 〇五〇	二, 五〇〇	二, 八二五	二, 〇七五	一七, 四七五
法	一, 二〇〇	一, 八五〇	〇	九七五	七〇〇	八〇〇	二五	五, 五五〇
德	七, 九〇〇	四, 三〇〇	八五〇	一, 〇五〇	二, 四〇〇	四, 五〇〇	一, 五五〇	二二, 五五〇
意	一, 六〇〇	一, 二〇〇	一〇〇	六五〇	九〇〇	一, 〇〇〇	〇	五, 四五〇
俄	二, 七〇〇	二, 二三五	〇	六五〇	二, 〇二五	一, 〇〇〇	八〇〇	九, 四一〇
美 (註)	五五〇	六七五	〇	八〇〇	八五〇	一, 〇〇〇	九〇〇	四, 七七五

(註)一月六日估計數

美空軍

山

少

